



旗袍被誉为中华女性服饰文化的代表,它以其流动的旋律、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,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、典雅、温柔、清丽的性情与气质。虽然现在已很难看见身着旗袍、左手执油纸伞、右手执香扇的雅致美女款款而步,但那唯美的景象至今很多人依旧向往。数千年来,我国对女性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,旗袍服饰也是封建主义对妇女要求的产物,但旗袍作为中国女性服饰美的元素已经被世界认可,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凤冠霞帔,母仪天下,如果说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把妇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这里,那么最能说明一切奥妙的关键字眼就是“表现”。把美好的体貌表现出来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装。

“霓裳羽衣”也好,“凤冠霞帔”也罢,除了对那种繁华尊贵的追求之外,无论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丽、渴望风采浪漫。旗袍的出现或许就因为如此吧。

人类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,女性的服装也随着历史不断改变。比起科技带给世界的巨大变化,人体却顽强地保持了原状,这虽然不能算是奇迹,却为服装发展史、提供了可能。服装不能脱离人体而孤立存在,旗袍也一样。女性的头、颈、肩、臂、胸、腰、臀、腿以及手足,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的完美整体。旗袍的审美,似乎可以从这里谈起。

东方女性的神韵

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提倡民族服装,日本的和服,朝鲜的韩装以及越南、泰国、印度、中东、欧洲、非洲,南、北美州,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。中国的旗袍以巧手精制细作,以形象逼真、造型完美的花扣和雍容华贵、合体大方的旗袍交相辉映……那样的女子,内敛、文秀、典雅,处处透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几代书香的熏陶,或动或静,一如清雅的国画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

海,在百乐门的跳舞场上,霞飞路的先施公司里,黄浦江畔的路灯下,常常有这样的女子闪过:烫发,描眉,勾眼,点唇,身着及膝或高衩的旗袍,织锦缎、洒花绸、水波绉、乔其纱,朱红、翠绿、宝蓝、金黄……衣香鬓影,流光溢彩,营造出十里洋场的香艳繁华。当然,旗袍也可以是朴素的。平常人家女子身上,大多是白夏布或丹士林布的自制旗袍,少了繁复的手工和精致的装饰,透出的是平和、温厚和安心。人就格外显得庄重、朴实、一斯文雅!在青瓦白墙的小院里,石板铺就的街道上,临河而筑的河桥旁,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忙碌身影。旗袍毕竟只是一种服装,不凡女子可以将它演绎得卓尔不群,“五四”时期的女学生身上的蓝布旗袍,配上一端垂于胸前,一端搭在肩后的围巾,洋溢的是年轻的书卷气和意气风发的热情;张爱玲可以用一件绿底红花的俗艳旗袍映衬才华横溢的清高。

旗袍的起源

旗袍始于清朝的满族旗人着装,已有300多年发展历史,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,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,是国际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女性代表服装。主要结构特征为立领、右大襟、紧腰身、下摆开衩等。旗袍在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,那雍容大方的款式,曾经使几代人为之倾倒,被世界公认为是能代表我国民族特色的服装。

在20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,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。旗袍是民国时期的妇女时装,他的最早的雏形,可以追溯到明朝中期的明立领中衣褶子,后移植到满族妇女的无领长袍上演变而来。由于满族称为“旗人”,故将其称之为“旗袍”。民国以后,上海、北平等地区的汉族女性在其基础上予以改良。1949年之后,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,尤其文革中被认为封资修象征大量毁坏。

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,可说

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,40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。20年代以后到40年代,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,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。也就是在此时,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,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。旗袍的样式很多,开襟有如意襟、琵琶襟、斜襟、双襟;领有高领、低领、无领;袖口有长袖、短袖、无袖;开衩有高开衩、低开衩;还有长旗袍、短旗袍、夹旗袍、单旗袍等。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袖式、襟形的变化。袖形的款式主要有:宽袖形、窄袖形、长袖、中袖、短袖或无袖。旗袍以其流动的旋律、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,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、典雅、温柔、清丽的性情与气质。

京派与海派

旗袍的京派与海派,代表着艺术、文化上的两种风格。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,标新且灵活多样,商业气息浓厚;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,显得矜持凝练。

艺术,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、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。设计师与旗袍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,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。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。经典相对稳定,而时装千变万化。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,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。旗袍是近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的传统时装,而并非正式的传统民族服装。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,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。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,加之可欣赏度比较高,因而富有一定收藏价值。

中国旗袍有与西方服饰审美一致的特征,并非偶然产生。在当时,上海这个中西文化杂处的大都市是最具条件的诞生地。现在我们或许已经难以寻找中国旗袍在上海诞生的确凿证据,但我们可以断言,海派袍是中国旗袍的典型。如果我们再胆大一点,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,现代旗袍,或侠义的旗袍,就是海派旗



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： 借助汉语造出日本文字

唐朝的时候，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盛况空前。从贞观年间开始，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“遣唐使”，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。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，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。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，使团回日本时，留学生(僧)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。

7世纪以前，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的传播。至推古天皇在位(593~629)、圣德太子摄政期间，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“遣隋使”、“遣唐使”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，主动学习中国文化，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，隋朝也是中国开始大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时期。

随使节一同来华

日本最重要的“遣隋使”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(607年)派出的。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，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，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。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。从开皇二十年(600年)至大业十年(614年)，日本派“遣隋使”达5次之多。公元608年，开创了随团派

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。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。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，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，希望通过这种措施，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，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，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。

唐朝的时候，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。从贞观年间开始，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“遣唐使”，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。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，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。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，使团回日本时，留学生(僧)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。

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。唐朝国子监有六学：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和算学，各学招生对象不同。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的功课。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，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，促进日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发展。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。

袍。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旗袍两字所引发的联想或意象，就是20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海派旗袍。近代旗袍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，衣片上出现了省道，腰部更为

合体并配上了西式的装袖、旗袍的衣长、袖长大大缩短、腰身也越为合体。

现代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特征：右



圣德太子像

晁衡：留唐任职，一住54年

阿倍仲麻吕(698~770)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，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。唐玄宗开元五年(717年)，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，当时他还不满20岁。入唐以后，他的学识和品行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，先后任校书、左补阙、秘书监、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。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，左散骑常侍是从三品，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。

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、李白、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。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，曾写诗《洛中贻朝校书衡》相赠。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，李白很受感

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，立领盘纽，摆侧开衩，单片衣料，收腰，无袖或短袖等。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特征之一，不是唯一的，也不是必要的。